

浅析王粲入邳前后“情志”文学思想变化

刘芳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9)

摘要:以王粲入邳前后为时间分界点,将王粲的家世家风和政治生活经历结合起来,双向并进,具体分析王粲在文学创作中关于“抒情”和“言志”的两方面内容,阐释其文学思想前后期“情志”的变化轨迹和内涵。

关键词:王粲;情;志;文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16)04-0067-03

Analysis of the Changes of Wang Can Literary Thought during in the Ye

LIU F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100089, Beiji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point before and after going into the Ye, it studied the changes of Wang Can literary thoughts, which have a general rules of early on the emotion and later on the will. In the study, contacting Wang Can's family and political experience, with literary work, two-way hand, it expained the changes. Firstly, it arranged Chinese ancient lyrical theory origin, then, analysed the literature regarding the emotion and will, to explain its trajectory and content.

Key words: Wang Can; emotion; will; literature; thought

王粲,汉末魏初文学家,诗赋文并重,诗赋尤为人称道,被刘勰誉为“七子之冠冕”。其“情志”变化具体表现在对乱离生活的深深幽怨和对儒家仁礼政教的拳拳志意中。根据吴云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建安七子集校注》(修订版)记载王粲作品现存有诗25首、赋26篇、文24篇。《三国志·魏书·王粲传》中说“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1]。曹植说他“文若春华,思若泉涌。发言可咏,下笔成章”^[2]¹⁰⁵;钟嵘说他“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3],这些足以说明王粲在文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充斥于作品中的“情”,更是王粲文学地位的丰碑,在他依刘表居荆州时期的赠答诗中,可见其情之真切;在他重要的诗赋作品《七哀诗》和《登楼赋》中,可见其情之哀婉。

但在阅读王粲后期的许多作品时,可以发现一个显著的变化,那就是以建安十三年(208)为分界

点,王粲由荆州改投邳下依曹操之后,其“情”转变为“志”色彩鲜明。这在其创作的“文”一类作品中有充分的显现,如《七释》《太庙颂》《难钟荀太平论》《蕤宾钟铭》等,此时王粲是以曹操的御用文人身份活动在文学舞台上的,创作主体思想归于仁义礼仪教化,这些多是为曹氏集团的歌功颂德之作和为汉室社稷着想的政论文,“尚情”思想暂居次要位置。

1 “情”“志”理论探源

我国文学的萌芽从远古时期就已崭露头角,原始神话开启了中国古人对文学的追求,中国文学一开始便以“诗乐舞合一”的杂文学观念作为开端,文学形式的发展自然带有文学开创期“杂”的典型特征,延伸到文学理论领域,对于“情”与“志”的讨论也以“杂”的特点为依托。中国古代《乐记》有云:“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

声。”^[4]这里的“物”就是“情”之源,是客体性存在,由“物”引动内心的涟漪,以致情感的抒发。钟嵘《诗品》中说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2]106},增加了“情”的概念。到了陆机《文赋》“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5]13},以“四时”和“万物”为基础,观物有感,感而生情。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6]65},“情以物迁,辞以情发”^{[6]693},刘勰认为诗歌创作不是凭空臆造,而是“情以物迁”,只有对外在的景物有所感触,才能唤起作者的共鸣,情由此出。从发生论角度来看,中国古代文学以“物”为基础,由“物”生“情”,眼中所见,心中所想,便形诸笔墨,对“情”的源起、生发和演变,有一个动态的隐性发展脉络。

对“志”的最早记录,见于《尚书·尧典》,“帝曰:‘夔,命立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2]1}这里的“志”与“歌”“声”“律”等同而论,带有朦胧化的意味,其“诗”、其“志”为何物,还有待探讨。到了汉代郑玄解释“诗言志”为“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7]12},“志”和“意”在此同一。陆贾《新语·慎微》中说:“故隐之则为道,布之则为文;诗在心为志,出口为辞。”“志”和“道”在此同一,表现为一种理性的思维活动。《毛诗序》提到的诗不仅要“发乎情”,还需“止乎礼义”。挚虞承接《毛诗序》,在《文章流别论》中表示:“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旨,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8]64}要求“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9]324},主张“诗言志”的观点,君子的写作要旨就是具有政治教化意义,劝美颂德,惩恶扬善。这是一次与“诗缘情”的正面交锋,之后的文人在主张“情”的同时,也相应地注意到与“志”的折衷,萧统编订《文选》专设“志”一类表达志向与怀抱的“言志”作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也提到“诗者,持也,持人性情”^{[6]65}。在文学创作基于抒情达意的本质追求之外,还需考虑到“志”的消解性质。

以上是“情”“志”发展的两条线索,而在《诗大序》中可以看到“情”“志”已经开始结合,“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10]7}到了班固《汉书·艺文志》中:“《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11]“情”“志”已经变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唐代孔颖达解释“此六

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9]15},“情”“志”显然合二为一。之后的陆机在《文赋》中更提出了“诗缘情”。陆机非常强调“情”的重要性,“诗缘情而绮靡”^{[5]56},更是特别强调了“情”的价值归宿。刘勰延续陆机的主张,提出“为情而造文”^{[6]24},反对“为文而造情”^{[6]24}。

对于“情”“志”,从汉代以后,就形成了基本的认识,一种是主张偏于感性的“情”;一种是偏于理性的“志”;还有一种就是二者结合的“情志”。从王粲的创作实践来看,显然是二者兼得,只是有一个时间差的顺序问题。

2 王粲的“尚情”观

刘勰说“情以物迁,辞以情发”^{[6]693},情感的表达是面对一处景物或一个事件,引起内心触动,从而有感而发。以此为基础,联系王粲创作与其经历的相关性,可将他的创作活动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以入邳为分界点,之前的文学活动主要集中于依刘表的荆州时期,之后的文学活动主要集中于依曹操的邳下时期。

王粲生当东汉乱世,为避董卓之乱,投荆州依刘表,因相貌怪异,受到冷遇,政治上不受重用,生活上不得安慰。建安十三年(208),王粲劝说刘琮投降曹操,因劝降有功,被曹操拜为侍中。这前后的经历使得王粲的心志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集中反映在他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形成了王粲的文学思想。

汉末魏初,朝代更迭,武帝时的“独尊儒术”统治思想发生颠覆,个人意识开始觉醒,战乱频仍,文人感到生命倏忽,开始更多地关注自身和生命,对个人价值的重视,表现在作品中。结合王粲到荆州后的遭遇,自然就有内心情感的流露,并伴随一种忧国忧民的悲苦之情。王粲正是在此时,完成对“情”的诠释。这一时期王粲代表诗作《七哀诗》(其一),就是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以“情”为主导,叙写全文。开篇以“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的大格局出场,面对满目疮痍的中原大地,王粲不得不离乡背井,前去投靠远在荆州的刘表,以白描手法将即将远离的故乡的惨状表现出来。再加以细节处理,“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在昏暗的色调中展现凄苦的情景,道出积压在王粲心底的幽怨,读者可以随着剧情发展感受作者的真情真意。

在他的赋作中,正如钟嵘《诗品序》提到的关于扩展“情”的范围的叙述,将“情”的范围扩大化,无所不包了。情感的激发,不受时间地点限制,不受具体事件限制,只要心中有感,便有所抒发。以《登楼

赋》为代表,这是一首以五言诗体写的赋文,关于写作时间,学界尚无定论,争论主要集中于创作于劝说刘琮归曹前还是归曹后。从赋整体的气氛来看,参照前人考证,暂且将其写作时间定于归曹前。首句“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以“忧”奠定全篇基调,“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点明“忧”从何而来。自比尼父、钟仪、庄舄,借喻匏瓜、井渫,自然表达情感。“悲旧乡”“涕横坠”“不寐”“反侧”,无不显露出作者心中的悲苦,且情感自然流露,毫无牵强附会之感。

王粲的赠答诗可谓情感表达的典范,蔡子笃、士孙文始、文叔良都是王粲的朋友,王粲与他们都有诗文往来。蔡子笃是与王粲一起同避荆州的好友,后来,蔡子笃要重回故里,王粲写了《赠蔡子笃》,表达对友人即将离开的不舍之情,“风流云散,一别如雨。人生实难,愿其弗与。”更是对其离开后的生活寄予祝福,最后以“中心孔悼,涕泪涟漉。嗟尔君子,如何勿思?”收束全诗,深化自己的不舍之情。《赠士孙文始》《赠文叔良》同样也是表达了对朋友的无法割舍之情,显示了王粲的重情特质,诗歌被情感包裹,可见其情之恳切。

总观王粲前期的诗歌,其情成分的比重占大部分,且以悲凉为主,为友出走,为己身世,为国家贫病,为百姓生灵。

入邳后的一些抒情小赋,也很能说明王粲文学思想中的“尚情”特质。《游海赋》《浮淮赋》《羽猎赋》《神女赋》等都是王粲跟随曹操南征北战途中的有感之作,曹操的文治武功与王粲的理想刚好契合,便促成了这一篇篇满怀壮志的佳作。在《游海赋》中,描绘了作战军队的强大,“乘菌桂之方舟,浮大江而遥逝。翼惊风以长驱,集会稽而一睨。登阴隅以东望,览沧海之体势。吐星出日,天与水际,其深不测,其广无臬。”《浮淮赋》中“白日不移,前驱已届。群师按部,左右就队。舳舻千里,名卒忆计”,也是对强大军队的歌颂与赞扬,饱含了自我陶醉于这种气势恢宏阵仗下的满足之情。

3 王粲的“尚志”观

王粲后期作品,也就是入邳归曹之后的文学创作,风格为之一变,尽管后期抒情小赋一类作品仍有“情”的因素贯穿始终,但从其作品整体性来看,已经开始以“志”为主导倾向,仅依靠情感支撑的作品已明显处于次要地位。且诗歌减少,赋、文增多,也恰好配合“尚志”的主题阐发,在文一类的应制之作中能很清晰地看到这一变化。

据史书记载,王粲出身名门,深受儒家思想教养,其曾祖王龚和祖父王畅皆为汉朝三公。可以说,王粲是伴随着儒家仁义礼教和经世治国理想长大的,依刘表时,有志不得伸,怀才不遇,郁郁寡欢。后依曹操,切身感受魏主的文治武功,深受鼓舞影响,创作了许多应制之作。在跟随曹操征战期间,王粲创作了许多昂扬积极的军旅题材诗歌,在这些作品中,能看到一个深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子弟拳拳深思与抱负。

《从军诗》是创作于建安二十一年的一组五首诗歌。《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有载:“二十一年春二月,公还邳。”裴松之注云:“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诗以美其事。”这是王粲归曹后极其重要的一组五言诗,主要是歌颂曹操的统一业绩。行文中,不见前期常常出现的“涕”“泪”“伤”“喟”等字眼,而以“神”“震”“威”“美”等替代,显然是感受于当下的曹营氛围,有感有思故有作。《从军诗》(其一)开头“从军有苦乐,但闻所从谁。所从神且武,焉得久劳师?”表现神武的军队和昂扬的气势,自信于战事告捷的势气。还有如“今我神武师,暂往必速平”“从军征遐路,讨彼东南夷”“筹策运帷幄,一由我圣君”“诗人美乐土,虽客犹愿留”。与前期的困守荆州时的低调显然差距极大,这些诗作无疑为曹操的战事起到了催发鼓舞的作用,面对魏主曹操的器重和信任,遵循一个儒家道统守护者的信念,这样的歌颂赞扬完全合于情理之中。

根据曹植的《七启序》,王粲的《七释》是一篇群体之作,具体阐述了人应该有所作为,不应该隐居遁世的思想内容。虚构了潜虚丈人和大夫两个人物,分别从美食、宫室、歌舞、美色等7个方面激发入世有为的志向,最后点出“是以栖林隐谷之夫,逸迹方言之士,鉴乎有道,贫贱是耻”的主旨。君子就应该将自己置身于世道之中,在道德和学识方面不断进步,以此来为国家社稷贡献力量。这又何尝不是王粲的自白书,身为深谙儒道的文人,为理想施展才华是他们的最终志愿。

《难钟荀太平论》是王粲针对钟荀《太平论》而作的驳文,主张“犯而刑之,刑不可错”,主要通过论述尧、舜、禹时期有奸逆不轨的人,都以各种办法惩罚,来说明现世应该用刑法来维持国家的安定局面,体现了王粲的名法思想。《爵论》提倡用授爵和夺爵使现任官员“与功大小相称而俱登”,还能使“慕进者逐之不倦矣”,让国家治理在可控范围内得到更好的发展。《儒吏论》针对“执法之吏不窥先王之典,搢绅之儒,不通律令之要”(下转第75页)

内开展更广泛的合作与分工,缩小地区发展差异,实现共同发展。

第三,承接产业转移,优化产业结构,促进长江经济带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长江经济带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优越,成为率先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区域,电子、机械、汽车等制造业迅速发展,成为我国制造业的中心。由于良好的工业基础,为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和技术支持。而中西部地区第一产业的比重仍然较高,二、三产业比重相对较低,因此,吸收东部沿海地区关于制造业产业的转移具体可行,因为对于东部而言的落后产业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仍有发展空间,有利于经济总量的提升,进而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和产业基础。

参考文献:

- [1] 张华平. 基于 SWOT 分析的河南省现代服务业发展战略研究[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1):127-131.
- [2] 赵翠红. 基于 SWOT 分析的河南省现代服务业发展现状研究[J]. 中外企业家,2015(34):64-67.
- [3] 石静,刘隽. 临沂市现代服务业 SWOT 分析与发展对策

[J]. 中国商贸,2015(4):149-151.

- [4] 陈静. 浙江省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评价[J]. 特区经济, 2010(8):48-49.
- [5] 邓泽霖,胡树华,张文静. 我国现代服务业评价指标体系及实证分析[J]. 技术经济,2012(10):60-65.
- [6] 孙治宇,刘星,樊士德. 江苏现代服务业发展综合竞争力[J]. 现代管理科学,2013(12):56-59.
- [7] 杨宇,任小金. 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法的我国现代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研究[J]. 工业技术经济,2015(5):80-86.
- [8] 吴传清,彭哲远. 长江经济带特大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区域经济评论,2015(3):125-134.
- [9] 吴传清,董旭. 长江经济带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J]. 学习与实践,2014(12):27-36.
- [10] 刘军跃,王伟志,赵晓敏,等. 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比较研究[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82-87.
- [11] 伏虎.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际市场依存与制造业升级——基于我国长江经济带的实证分析[J]. 商业经济研究,2015(27):115-116.
- [12] 钱力,李学慧. 甘肃省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评价与对策研究[J]. 兰州文理学院学报,2015(5):40-45.

(上接第 69 页)的问题,提出儒吏要受到相应的教育,达到“宽猛相济,刚柔相克”的目的,更好地管理百姓、治理国家。儒家有道德本位倾向,其“和”的理念是以德法并举为前提的,这三篇政论文,集中反映了王粲的“治国之志”,具有鲜明的法治思想,可以说是他“志”的集中体现。

还有如《安身论》里关于探讨自私之人和有欲之人不可能具有高尚的道德的修身齐家之论,也有关于论述农业乃治国之本的《务本论》。篇篇都闪烁着儒家仁义礼智信的熠熠光辉,将“志”的主张贯穿在他辅佐曹操成就霸业的始终。

可见,“尚情”和“尚志”是王粲文学思想中两条并行不悖、互相补充的线索,与王粲下荆州、入邳下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联。王粲入邳前后的生活和心志会根据时局、环境的不同而相应做出调整,其“情”其“志”虽各有侧重,但毫无违和,反而使王粲的文学思想愈加显得丰富充盈。

参考文献:

- [1] 陈寿. 三国志[M]. 裴松之,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6:

84.

- [2] 郭绍虞. 中国历代文论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 [3] 周振甫,译注. 诗品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98:4.
- [4] 郑玄,注. 礼记正义·卷三十七[M]. 孔颖达,疏.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254.
- [5] 张怀瑾,译注. 文赋译注[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 [6] 范文澜,注. 文心雕龙注(下)[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 [7] 郑玄,注. 尚书郑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6:12.
- [8] 郑奠,谭全基. 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文章流别论辑佚[G].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64.
- [9] 郭绍虞. 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10] 朱光潜. 诗论[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7.
- [11] 班固. 汉书·卷三十[M]. 北京:中华书局,1964:1708.